

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迁移动因的多维探讨

傅义强*

摘要: 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是中国跨国移民也是当代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兼有国际移民、中国大陆新移民以及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性。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产生和持续发展的动因有三层维度:在宏观上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与其他国际移民一样,是全球化的衍生物;在中观上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是华人移民的重要一支,跨国移民网络的形成使他们得以持续发展;在微观上欧盟及各国的移民政策导致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不断迁移变化。

关键词: 欧盟国家; 中国大陆新移民; 迁移动因

国际移民理论中的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新迁移经济学派、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对国际移民的产生以及移民网络说、累积因果说和移民系统理论对国际移民的持续发展进行了综合解释,然而这些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主要是针对非华人移民群体而言的,尽管它们也适用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为国际移民的共同特征,然而还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特性。因此考察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迁移动因,必须要有三层维度,宏观和中观层次的原因是针对国际移民和中国大陆移民来说的,而微观层次的原因是针对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来说的,这是一个具体的研究。

一、宏观难度: 欧盟国家中国大陆新移民是全球化的衍生物

全球化本身具有超越国家边界的含义,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全球化的概念最后被理解为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ng)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我们应该依据时空分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蔓延。”¹虽然他强调的是远距离发生的社会事件与地方性场景的关系,意味着地方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远距离事件的影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个逾越地方性区隔的问题,由此就产生了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口的跨国流动,从而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因此,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流动性,它不仅对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造成冲击,而且在不断流动和跨越国家所形成的区隔限制过程中形成新的具有世界主义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国际移民因此产生,他们不断超越地界和国界,在国际间流动,成为没有地域界限的公民(unbounded citizenship)。

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是当代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被封闭孤立的中国进入了全球化的轨道,曾一度中断的移民又再次恢复,而这次的恢复不再是近代以来被迫的移民,而是一种主动的移民,他们是因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球的发展轨道而产生,成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往的传统移民不同,他们不再是从移出国向移入国单向迁徙,最后或者逐渐融入乃至同化于当地社会,而是

* 作者简介,傅义强,男,南方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

¹ 安东尼·吉登斯著,赵旭东、方文译:《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

不再局限于一地，不断逾越国家所形成的区隔、重建区隔又在寻求打破区隔形成新的逾越的连续过程。以浙江温州人为例，他们不断向外拓展生存与发展的渠道，将“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拓展到海外，在欧盟各国及至世界各地，都有“温州城”、“温州商业街”。在法国，温州人虽然是随族而聚集，但是在行动上和认识上并不局限于法国，他们要求获得永久性居民身份是为了逾越法国国界，逾越他们在法国形成的区隔，更容易进入全欧洲乃至全世界，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就如同他们在中国大陆的自由流动一样。所以他们已形成逾越区隔、国界的身份意识和观念，不断向外拓展视野和行动范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亚洲学院的副教授楚诺伊就强调指出：中国移民所代表的是新的潮流，他们并不属于历史沿袭的移民传统，他们突然出现在欧洲，我们必须将它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主义联系起来看。中国移民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是因为他们是全球性移民的代表。²福建新移民更能说明问题，他们遍布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性移民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对他们来说，移民欧洲与移民美国没有什么两样，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当今在福建本地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台湾怕平潭，美国怕亭江，日本怕福清，英国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这就形象刻画出福建新移民向全球蔓延的趋势。有些新移民甚至在迁移过程中还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他们往往在途中根据得到的信息而确定移民的方向，这看似充满着偶然和非理性，其实是全球化移民浪潮冲击的结果。

国际移民学专家斯蒂芬·卡斯尔斯指出：“移民既是全球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是移民输出社会和接受社会进一步变化的强大推动力量。”³这说明，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并非是单向度的线性发展，而是“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以往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如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世界体系论往往从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出发，强调全球化所引发的大量国际移民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引起的劳动力调整的过程，从西方国家的“吸力”角度单向度地解释了国际移民从不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的迁移现象。但是它们无法解释在当代国际移民中还存在向不发达地区迁移的现象，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并没有按照他们所设想的那样理想发展，美国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指出，“常识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双赢局面，但这越来越显得象黄粱美梦。”⁴斯蒂芬·卡斯尔斯认为全球化进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悖论，全球化不但没能缩小贫国与富国的经济差距，反而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并且还分化出两个移民群体即已经成为全球秩序中真正成员者和被边缘化者，这便产生了接纳与排斥的矛盾。他指出：“对某些人予以接纳、而对另一些人加以排斥的进程，似乎是市场的无形力量操纵的结果。因此，没有任何个人、机构或国家对发展承担责任，这就可能造成数百万人的贫困化。市场的胜利，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国际层次上，都意味着许多当权者已不再把极端不平等视作一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提高经济体制效率的关键。”⁵之所以出现这些悖论和看似“反全球化”现象，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这是西方所主导的全球化。

全球化应当是“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国并不是被动卷入全球化的进程，而是一种主动的挑战，使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并影响世界。牛津大学的彭轲教授将之称为“中国的全球化”，是“多元”全球化中的重要一元。⁶在当

² BBC 专题：“欧洲的中国非法移民”，<http://lkc.net/bbs/index.php?showtopic=10813>

³ 斯蒂芬·卡斯尔斯著，黄语生译：《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2期。

⁴ 《全球化遇到民族主义的羁绊》，美国《国际先驱导报》2006年1月25日。

⁵ 斯蒂芬·卡斯尔斯著，黄语生译：《全球化与移民—若干紧迫的矛盾》，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2期。

⁶ Frank N. Pieke, *Chinese Globalization and Migration to Europe*,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今世界上,中国商品、中国资本以及由中国移民带往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相互交织,越来越鲜明地彰显着“中国特色的全球化”。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的产物,浙江和福建的新移民是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们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移民的条件与机遇,他们不再像传统移民那样被动的谋求“温饱型”,而是积极主动的自愿的走出家乡、跨出国门去谋求富裕与发展。基本上浙江和福建侨乡都不是非常贫穷的地区,对于来自这些地方的新移民来说不存在生计的问题,他们中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移民,几乎所有的人都怀有一个挣钱做老板的梦想。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在英国莫克姆湾惨案发生一年后,仍有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在冒险拾蛤,其中一名说道,“虽然危险,但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试试。我被抓到只是一个例外,许多来英国的人都发了财。”⁷可见,尽管移民过程中风险及花费很大,但他们认为挣钱和发展的机会很大。正如彭轲教授对福建新移民的认识:“整体而言,他们不是不道德的人口走私者的不幸受害人,也不是逃离政治压迫的政治避难者,也不是被西方福利国家的利益所吸引。他们应当被看作是自己而打工,最终是为了财富。”⁸因此,哪里有挣钱和发展的机会,哪里就流向哪里,他们常常抓住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机会,通过种种手段和途径向世界各地渗透并迅速遍布全球。他们因此也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观念,迁移不再局限于一个地方,只要条件成熟就会再次迁移,持续不断的迁移已不是什么异常的事,而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目前,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浙江和福建新移民的身影。目前国内和国外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哪儿有市场,哪儿就有温州人;哪儿有温州人,哪儿就有市场”,这说明中国的全球化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大陆新移民不仅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的产物,更是中国的全球化的产物。

二、中观难度:跨国移民网络的形成是中國大陸新移民持续发展的动因

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是华人移民的重要一支,他们与前往其他地区的大陆新移民一样,靠社会资本而建立的跨国移民网络是其持续不断移民的又一动因。随着跨国间流动,新移民建立了由无数具体的纵横交错的跨国关系构成的全球华人经济和社会网络。华人经济网络仍然延续中国式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模式,以欧洲为例,浙江人“小商品、大市场”和“家庭作坊式”的温州模式得到拓展,是当地华人经济的主要部分。中国新移民为非华人经济而生产,但没有直接与非华人工人和企业竞争。彭轲教授等人在欧洲的调查中发现,福建新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欧洲不是为非华人经济工作,而是被雇佣于华人劳动力市场,远离非华人劳动力市场而存在。尽管华人劳动力市场是从非华人劳动力市场分离出来而存在的,但是它却是全球华人劳动力市场的一环。华人劳动力市场的存在虽然也存在内部的竞争,但却有效地保护了中国新移民避免受到当地平衡劳动力供需的冲击,为新移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华人社会网络,移民依靠一定的社会网络实现跨国迁移,不但减少了风险,而且也有很快改变现状,得以发展。社会资本就这样以跨国移民网络为基本载体,通过一次次的跨国运作而不断增殖。因此学者李明欢教授指出,当移民作为一种投资途径并且存在有效运作空

Working Paper No. 94, March, 2004.

⁷ http://news.yninfo.com/guonei/gedi/2005/6/1117673879_14/

⁸ Frank N. Pieke, *Recent Trends in Chinese Migration to Europe: Fujianese Migration in Perspective*, Switzerland: IOM Migration Research Series, 2002, Vol.6, p.34.

间时, 移民行为必然生生不息。⁹由此可见, 中国大陆新移民虽然是由“多元、多中心”的全球化所推动, 但获得持续发展的最强劲的纽带却不是全球化, 而是全球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跨国社会网络。

跨国社会网络是在早期移民所构建的海外关系的基础上扩大、形成的, 学者王春光和李明欢等人在考察浙江温州侨乡与福建侨乡的基础上, 都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侨乡新移民基本上都是借助海外亲缘关系, 以家庭团聚为名出国的。他们出去以后不久, 就亲戚带亲戚, 亲戚再带亲戚的亲戚, 朋友带朋友、朋友再带朋友的朋友, 连锁拓展的功能被利用得淋漓尽致, 随着新移民滚雪球似的扩大, 跨国移民网络也不断扩展。因此, 目前中国最典型的跨国社会网络就是侨乡与迁入地的移民之间以血缘、地缘和情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种种特殊联系。这决定了新移民拥有双重身份, 他们既属于故土, 又属于移入国。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始终与家乡以及在国内、国外的亲朋好友保持密切联系。香港学者王苍柏指出新移民在迁入国建构了一种“外地域认同”, 他们将认同根植于熟人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想象之中, 而不是僵化的地理疆域, 这样才可以“既处处为家, 又无处为家”, “既在此, 又不在此”。¹⁰这种“外地域认同”其实也是多地域认同, 他们改造和利用了故土的地域和血缘关系, 也利用和改造了移入国华人圈子和社会政治资源, 这样才编制出跨越国界的社会网络。

台湾学者廖正宏认为: “以前的迁移者可能提供有关的资讯, 以鼓励以后的迁移而产生迁移过程的连锁反应。结构网络的范围很广, 它与迁移过程的关系是双方面的: 第一, 经济与社会网络大大的限制迁移的类型。第二, 迁移本身可改变或增强网络。”¹¹目前, 从浙江南部侨乡和福建侨乡来看, 通过跨国社会网络形成了三种类型的移民: 家庭团聚移民、劳工移民和偷渡客。家庭是社会网络的核心, 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也是把家庭作为核心内容, 两者在这里找到了衔接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许多福建人和浙江人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出去的。这些早期出去的移民有些已当上老板, 经营自己的家族生意, 于是又以输入劳务的名义把自己的亲戚带出来, 而没有当上老板的人也可以借助社会网络, 找到已成为老板的亲戚、朋友, 也比较容易地把自己在国内的亲人弄出来。社会网络也是偷渡客主要倚仗的手段, 他们实施偷渡过程中, 社会网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学者王春光是这样描述温州人到巴黎的偷渡程序的: 国内的人先找到其在巴黎的亲戚或朋友, 征得他们同意帮助偷渡后, 在巴黎的亲戚朋友出具一份经济担保, 寄给国内的人, 让他们持此信到公安局办理护照, 拿到护照后, 寄给巴黎的亲戚朋友, 而后者拿着护照找蛇头, 并谈好偷渡价格和付款方式。蛇头把偷渡者带到巴黎后便打电话给偷渡者的亲戚朋友, 要他们交钱领人, 或者叫他们打电话给国内, 要求偷渡者家属向国内某个人交完钱, 才放人, 由他们亲戚领走。王春光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偷渡客与蛇头取得联系的惟一渠道, 没有社会关系, 很难知道蛇头在哪里, 怎样跟他们谈好偷渡的条件。¹²因此, 拥有海外社会关系越多的地方就越容易偷渡, 偷渡的成功率较高, 导致更多的人走上偷渡的道路, 这也是目前福州侨乡和温州侨乡成为偷渡国外的热点地区的原因之一。而且, 社会网络也决定了偷渡的目的地, 一个人在哪个国家的社会关系越多, 而且越可靠、亲近, 他就越可能往这个国家偷渡。

由此可见, 跨国社会网络具有累计和扩展能力, 所谓累计能力是指各种社会关系具有量的规定性, 一个人在海外的亲戚越多, 那么他出国机会就越大; 所谓扩展能力是指亲戚带亲戚、朋友连朋友式的连锁移民使得每次迁移都成为后来者的资源, 都在为以后

⁹ 李明欢: 《“侨乡社会资本”解读: 以当代福建跨境移民潮为例》, 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¹⁰ 王苍柏: 《也谈华人》, 载《读书》2004年第10期。

¹¹ 廖正宏: 《人口迁移》, 台湾三民书局印行1986年版, 第150页。

¹² 王春光: 《巴黎的温州人——一个移民群体的跨社会建构行动》,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67页。

的移民牵线搭桥，而新的移民又导致了网络的扩展和进一步发展，于是原本与网络没有关联的人也被纳入其中。因此，跨国社会网络的扩展不仅加大了出国的机会，也拓宽了出国的渠道。社会网络在传递移民信息和经验的同时，也构筑了人员流动链，在这样的流动过程中，社会网络越织越大，覆盖面越来越广，反过来，又推动着移民潮的不断延伸和继续。

跨国社会网络的拓展与加强使侨乡与海外联系紧密，越来越多的移民往来穿梭于家乡与海外之间，互动频繁。他们汇回侨乡的钱款以及在侨乡的“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使家乡尚未移民的人“相对失落感”加剧，因此产生移民的强烈动机，进而引发新的移民。伴随着这种失落感的产生，在侨乡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出国文化”，成为进一步推动移民的驱动力。对于在海外的侨乡人来说，能否帮助家庭的人或亲戚出国以及带出去的人数多少，不仅是道德义务，也是提升自己与家族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对于侨乡尚未出国的人，尤其是成长中青年人来说，出国文化已占据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们从就业取向到人生目标均与出国移民融为一体，因此尽管有些人海外并没有直系亲属或是家中收入较高可以在国内过舒服日子，但仍然选择出国移民的道路。这看似非理性，但却是出国文化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正如此，成长中的一代代新人往往下意识地或在群体及个人均认为理所当然中追随其前辈走上移民道路，新移民持续不断的发展成为必然。

三、微观维度：欧盟国家移民政策的影响着中国大陆新移民的迁移

移民政策是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的集中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移民，是当代国际移民中最主要、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国际移民明显受到迁出国与迁入国双方政策的影响，然而，两相比较，迁入国政策对于移民是鼓励、允许、限制还是严禁，对移民的影响较之迁出国政策要重要得多。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福建侨乡 99% 以上的亲缘关系都在东南亚，但是由于当代东南亚执行紧闭移民大门的政策，因此在近 20 年的迁移潮中，东南亚始终没有成为福州侨乡移民的主要目的国。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的所谓“出生证回迁”传闻，曾迅速诱发福州地区的赴日潮，然而进入 90 年代后期，由于日本总体经济增长下降后加强惩处非法移民，无证打工收入锐减，因此当地的赴日潮明显回落。相反，西欧却成为福州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这是因为目前欧盟及各国移民政策的矛盾性给移民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因此在全球化和跨国移民网络作用下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便能够充分利用政府政策间的“空洞”，以其坚忍不拔的穿透力和灵活性不断超越政策界线及至超越国家权威，持续不断地进入欧盟各国。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自世界性石油危机以来，欧盟各国的移民政策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均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对外来移民采取不欢迎态度。然而这一限制性移民政策并没有阻挡住此后一波又一波向欧盟国家的移民潮，为何如此？其原因就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在于欧盟的限制性移民政策并未成熟，充满着矛盾，缺乏完善和有效性。一方面源于白色人种可能淹没于有色人种之汪洋大海的潜在恐惧，担心外来移民会夺走本已有限的就业机会，会加重欧洲福利社会的负担，再加上原有的种族歧视的情绪以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影响，因此西欧各国无不对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严加控制。另一方面，西欧各国出于经济、政治以及价值观的考虑，又需要外来移民。因此这了限制性移民政策中充满着限制与接纳、融合与排斥的矛盾。这一限制性移民政策的矛盾运作给了外来移民很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导致外来移民源源不断流入。限制性移民政策几乎只是一相

情愿的梦想,结果却是真正限制了可贵的人才和财富进入欧洲,而对于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途径而不断地、大量地涌入欧盟国家的移民却根本无能为力。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国家的中国大陆新移民主要是非精英移民而不是精英移民的主要原因。

欧盟移民政策对中国新移民的影响是直接的明显的。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中国与西欧各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曾在“文革”中一度中断的侨乡与欧盟各国的海外关系又联结上了。此时,欧盟的移民政策虽然已收紧,但由于战后前往欧盟国家的“客工”滞留下来,他们有着强烈的家庭团聚的要求,因此欧盟各国出于人道主义,都实行了家庭团聚政策。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就抓住这一契机得以进入欧盟各国。西欧之所以对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的家庭团聚移民大开绿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长期冷战思维的影响,把中国人移民西方视为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移民申请在西欧获准率相当高。西欧对中国的家庭团聚移民注入更多的意识形态的因素,有的官员甚至指责中国政府缺乏人道主义,应当放宽对国人的出国管制,希望拉动中国移民“冲破红色铁幕”,对于中国潜在的移民人口数量既无预见,更无任何心理准备。因此,中国进入西欧的人数迅速上升,形成最初的流向西欧的移民潮。

如果说,出于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考虑的家庭团聚政策与限制性移民政策的矛盾还不明显的话,那么西欧国家的大赦政策则充分暴露了其移民政策的矛盾性。大赦的背后交织着多重原因,既是内部政党斗争的结果,也是减少民族冲突、维护国内安全的要求,既是为了缓和国内劳动力市场紧缺的状况,也是维护被雇佣者的合法权益。总之,大赦的实行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外来移民的限制,这也导致了外来移民能够冲破限制性政策,持续不断地进入欧盟各国。表1显示了上世纪80、90年代,欧盟国家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的情况。大赦使中国大陆的新移民看到了除家庭团聚移民之外的另一条道路——非法移民。大赦是雇主及社会利益集团压力的结果,通过大赦缓和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劳工紧缺的压力。每次大赦,都给了被赦非法移民的来源地的同胞及其他国家、地区的潜在非法移民群体一个巨大的“社会心理暗示”和鼓舞,唤起或加速了他们的偷渡欲望与行动。于是,每一次大赦,伴之而来的总是一次新的更大规模的偷渡潮。对于中国大陆新移民来说,偷渡根本就不是什么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而只不过是缺乏先赋条件的移民靠自身“奋斗”及“运气”而选择的出国途径。因此,在欧盟各国,很快就积聚起了越来越多等待“身份合法化”的中国人,而当前一批人“拿到身份”后,更多的后续者又源源而至。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欧洲加速了一体化进程,1985年“申根协定”签署,1987年“欧洲单一法”生效,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1993年底“马约”(欧洲联盟条约)生效,标志欧洲联盟成立。欧洲一体化加强了内部人员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对外来移民在欧盟范围内流动的限制,加之欧洲各国边境缺乏天然的屏障,因此,欧盟国家的每一次大赦对欧盟其他国家境内的非法移民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促使他们在欧盟范围内一次次迁移流动。一旦哪个国家有大赦的迹象,他们便会涌向哪个国家。一旦这次申请失败,他们必会期待下一次。不少非法移民就被大赦这只“无形的手”牵着鼻子走。意大利大赦时,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就会涌向意大利,而西班牙大赦或是葡萄牙大赦时,他们就会再次迁移,流向西班牙或是葡萄牙,形成一次次欧洲境内特殊的偷渡人流涌动。这无疑是欧盟内松外紧的移民政策与各国的大赦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可见,欧盟矛盾重重的限制性移民政策非但没有减少外来移民,反而导致欧盟国家非法移民大量存在。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为例,两国在开展大赦行动之后,1996年意大利的在册外来移民人数增加了20多万,增幅达40%,西班牙也增加了26万,增幅竟高达93%。¹³中国在意大利的非法劳工也从2000年起的短短5年间,

¹³ 转引自高伟浓等著:《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由 1.6 万人骤增到 10 万人。¹⁴

表 1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对非法移民历次“大赦”情况

国别	序次/时间	法律形式及要求	获赦人数
法国	第一次 /1981.8 — 1982.6	《无合法证件的外国人就业法》(总统令)	13.2 万人
	第二次/1992 年开始	“放宽移民政策”相关条令	数万
	第三次 /1997.6.24 — 1999 年初	“无证者身份合法化行动”	约 8 万
意大利	第一次/1982	劳工部法令：所有雇主需为其所雇佣“无证非欧共体劳工”办理“合法化”手续	1.6 万人
	第二次/1986.12.30	943/86 号法令	118706 人(至 1988 年 9 月 30 日人数)
	第三次/1990.2.20	39/90 号法令(延期至同年 6 月 30 日)	21.7 万人
	第四次/1995.11.8	总统签署 DL/489/95 大赦令	约 23 万(至次年 3 月人数)
	第五次/1998.11	“关于移民问题的法律总则”	申请者逾 30 万人，获准者不详
西班牙	第一次/1986	根据 1985 年通过的《外国人法》	34822 人
	第二次/1991	“西班牙外国人政策的基本路线”(国会)	108321 人
	第三次/1996	人民党上台后改革 1985 年《外国人法》	24691 人
	第四次/2000	“无证者身份合法化行动”	85526 人(截至同年 7 月 31 日)

资料来源：据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3—495 页成表。又参阅欧华热线网 (<http://www.olin.com.cn/bbs/dispbbs.asp?BoardID=4&ID=35647>)，《“大赦”白皮书》。

除了以上正式的大赦之外，欧盟国家的中国非法移民还有一个转换身份的途径，那就是申请“政治避难”，以求得到特别庇护。而欧盟国家避难政策也给非法移民的存在提供广阔的空间，成为中国大陆非法移民向欧盟国家迁移的又一驱动力。应当说在 1989 年之前，很少有中国人懂得什么西方的“难民政策”，是欧美等西方国家教会某些中国人将“政治避难”作为又一条新的“曲线移民”之路。20 世纪 90 年代初，欧盟主要国家仍然延续冷战思维，纷纷以“政治原因”给予中国人以各种特别居留。许多中国人向欧美各国申请“难民身份”，从“参加民运”、“受害于中国政府的一胎化政策”到“受地方官员迫害”等，种种理由，五花八门，在 1989—1993 年，有 23120 名中国非法移民向欧盟国家提出避难申请，1994—1998 年，有 25550 名提出避难申请。¹⁵这些避难申请绝大多数是虚假的。英国内政大臣司特朗曾指出：每月有 400 多中国人到英国申请庇

¹⁴ <http://news.sina.com.cn/w/2005-03-27/00085472793s.shtml>

¹⁵ 参见联合国高级难民专员公署，1999 年，表 VI.7，转引自高伟浓等著：《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表 4.8，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96 页。

护, 其中 99% 的人都没有受到迫害, 都是经济移民。¹⁶

避难权的滥用使欧盟国家不胜重负, 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与措施收紧避难权。欧盟国家对申请政治难民的中国人, 采取了较之以往严格得多的重重审核。经过调整, 欧盟国家的难民政策越来越完善、成熟, 对难民资格越来越多限制, 门槛越来越高, 难民的甄别标准也越来越严。中国人申请“政治难民”的获准率直线下降, 以法国为例, 来自中国的申请者获得“难民证”的比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70-80% 下降到 90 年代末的 3%。¹⁷然而在“升格”为难民越来越难的情况下, 仍然有许多非法移民前往欧盟各国去当“难民”, 这是因为欧盟国家在政策执行中还存在一定的空间让非法移民可以利用。一般来说, 一个非法移民在欧盟国家正式提出“难民”申请, 便获得暂时居留权, 直至他最后被拒为止。而当局在处理申请的过程通常长达两至三年, 这期间, 这些申请者不仅东道国以人道理由允许其合法地暂留当地, 而且还可以在当地找工作谋生。因此, 许多非法移民希望能在这么长的暂居期间找到转机, 期盼大赦来转换身份, 即便不行, 也可以在当地打工两三年小赚一笔, 然后打道还乡。在荷兰, 非法移民以政治避难的理由向政府申请政治难民身份是相当容易的, 荷兰政府还给申请人免费提供一些小镇的一二星级酒店的住宿。在当地, 临时居留证过期前两次被查到不受罚, 第三次被查到也只判两周监禁, 释放后也依然可以“黑着”打工, 而警察鉴于人道原因不会随便去查身份证件。因此, 荷兰成了非法移民名符其实的“天堂”和前往第三地的集散中转站。¹⁸

可见, 虽然欧盟国家都实行限制性移民政策, 然而实际执行不力, 这也给非法移民提供生存空间, 导致外来移民的纷纷迁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楚诺伊副教授就认为, 欧盟某些成员国劳工法实施不严格是吸引中国非法移民的一个重要原因。¹⁹这正是欧盟矛盾的移民政策在现实中的体现。欧盟国家在主观意愿上都强烈希望保护本民族的经济利益, 不愿外国人参与分享其社会福利, 因此, 限制外来移民的进入; 可是, 其经济发展、社会福利改善的结果之一, 是长期存在着一个本国人不愿进入的环境相对艰苦、收益相对低下的“下层就业市场”, 只能由来自第三世界的外来移民进行填充。同时, 欧盟国家的许多雇主们为了牟取高额利润也愿意雇佣“价廉物美”的外来移民。由于欧盟国家实施高福利、高税收政策, 因此雇佣一个具有完备手续的正式工人, 雇主要为其交纳各种保险, 其费用比雇佣一个非法移民要高得多。正因为如此, 欧盟国家各类企业违规雇佣无证移民屡禁不止。政府无奈之下也只得默认现实,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外来非法移民在社会的边缘中生存下去。

由此可见, 欧盟国家的大赦政策、难民政策以及在执行移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吸引了大量非法移民源源不断迁往欧盟各国。当然, 欧盟各成员国的情形并不是铁板一块,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由于工会力量强大、劳工法实施严格、经济发展平衡、就业较为饱和等因素, 决定了人口走私团伙以及中国非法移民通常把目标转向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德国等西欧国家, 并形成潮流。外来移民一旦形成移民潮, 即不可能是欧盟各国政府可以任意开关的水龙头, 他们的迁移再带很强的主动性, 可以冲破限制政策控制的闸门, 使得肆虐的潮水不断向欧盟国家漫延。中国大陆新移民也是这潮水中的一支, 在全球化浪潮和跨国社会网络交互作用下, 他们最能敏锐地把握欧盟移民政策及其变化, 并从中拓展移民的空间, 不断迁移至欧盟国家, 又不断向整个欧盟范围内扩散。

¹⁶ 转引自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24 页。

¹⁷ 李明欢:《欧洲华侨华人史》,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525 页。

¹⁸ <http://www.fjzg.org/czyz/2003czyz/0520-czyz-fz.htm>

¹⁹ BBC 专题: 欧洲的中国非法移民, <http://lkc.net/bbs/index.php?showtopic=10813>

Discussion about the Cause for Immigration of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nts to EU Countries

Fu, Yiqiang

Abstract: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nts to EU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constitut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migration and also of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o it has the character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tion and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tion to EU countries. The causes of the birth and persist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tion to EU countries include: first, from a macroscopical view, it is a derivative of globalization, just like othe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econd, it i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twork of multinational migration provides their persistent development; third, from a microscopical view, the land settlement policy of EU and other countries results in its constant migratory change.

Key words: EU countries, Chinese mainland new immigration, the cause for the immigration